

岭南维新思想述论

宋德华 著



中華書局

岭南维新思想述论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中心

宋 德 华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岭南维新思想述论/宋德华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2

ISBN 7-101-03291-5

I. 岭… II. 宋… III. 改革-思想史-中国-近代 IV. D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7710 号

责任编辑:凌金兰

岭南维新思想述论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中心

宋德华 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朝阳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6¹/₂ 印张·375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26.00 元

ISBN 7-101-03291-5/K·1421

目 录

导 论	(1)
一 兴起的原因	(2)
二 发展的轨迹	(12)
三 历史作用	(16)
第一章 突破中学束缚的新思想体系	(19)
第一节 崇尚新知的哲理思想	(20)
一 新气质论	(20)
二 新人性论	(27)
三 新发展论	(39)
第二节 注重人道的行为准则	(44)
一 自主之权与天赋人权	(45)
二 普遍的平等	(50)
三 兴爱去恶与去苦求乐	(62)
四 对传统纲常礼教的否定和批判	(67)
第三节 追求民主的大同构想	(74)
一 大同构想的三个阶段	(74)
二 大同理想制度的主要设计	(86)
三 实现大同的渐进之路	(113)
第二章 疑古用古的学术观	(143)
第一节 研究传统文化的新思路	(144)

一	以求道之心和经世之念治学·····	(144)
二	《民功篇》和《教学通义》·····	(149)
第二节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重释·····	(183)
一	新学伪经说·····	(186)
二	孔子改制说·····	(213)
第三节	孔子之道的重建·····	(241)
一	融孔子、董仲舒和康有为为一体的 《春秋董氏学》·····	(241)
二	阐释孔子大同论文本依据的《礼运注》·····	(262)
第三章	成熟完备的变法观(上)	
——	变法指导思想·····	(280)
第一节	必变大变速变论·····	(280)
一	必变论·····	(281)
二	大变论·····	(294)
三	速变论·····	(301)
第二节	君权变法论·····	(304)
一	理论与事实依据·····	(304)
二	以变法为实质·····	(309)
三	对君权现状认识不足·····	(322)
第三节	“变于下”论·····	(324)
一	“变于下”的必要性·····	(325)
二	兴学开智论·····	(328)
三	合群论·····	(331)
四	人人发愤知耻救亡论·····	(338)
五	振士气论·····	(344)
六	办报以去塞求通·····	(349)

第四节 兴民权论	(351)
一 议院观	(352)
二 民主大势论	(366)
三 公私权限论	(369)
四 重民论	(374)
五 男女平等平权论	(378)
六 权智关系论	(380)
第四章 成熟完备的变法观(下)	
——变法方略和变法主张	(384)
第一节 变法纲领及次第	(384)
一 上清帝一至四书的变法纲领	(385)
二 从《上清帝第五书》起的新变法纲领	(388)
三 变法次第	(397)
第二节 变法策略	(399)
一 君主以现有之权,行可变之事	(400)
二 分别官差,以行新政	(400)
第三节 变法主张	(404)
一 改革科举制	(404)
二 尊崇孔教	(408)
三 奖励创新	(410)
四 设立学堂	(412)
五 开报馆定报律	(413)
六 振兴商务	(414)
七 禁止缠足	(416)
八 振兴农业	(417)
九 设议政之官	(418)

第五章 逐步深化的西学观	(420)
第一节 中西之学的全面比较	(420)
一 中西之异的辨析	(421)
二 中西之同的定位	(428)
三 力主中西结合	(438)
第二节 《日本书目志》:中西比较的深化	(442)
一 强调讲求西学的重要性	(443)
二 考求西政西学与中国经义的“暗合”	(447)
三 揭露中国历史和现实之弊	(455)
第三节 西方富强之道的总结	(457)
一 诸国并立激发竞争	(458)
二 农、工、商、财皆行新法	(459)
三 文教、科技开智创新	(463)
四 广设学会、社团、政党	(465)
五 设议院以通下情、尊民权	(468)
第四节 《日本变政考》——实践和转换	
西方富强之道的个案考察	(468)
一 变法总类	(470)
二 君臣关系	(476)
三 政治改革	(478)
四 民事改革	(489)
五 经济改革	(494)
六 文教改革	(496)
七 社会改革	(501)
八 法律改革	(506)
九 军事改革	(507)

十 外交改革·····	(508)
主要参考书目·····	(510)
后 记·····	(514)

导 论

19世纪末叶,伴随着戊戌变法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中国出现了颇有声势的维新思潮。这一思潮波及相当多的省份,而岭南堪称其主要发源地之一,岭南维新派则是此思潮的一批最重要的代表。所谓岭南维新思想,就是将岭南地域、岭南人物两个视角结合起来所构成的维新思想,它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潮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自从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等早期专门著述问世以来,学术界研究维新思潮的成果日渐丰富,其中很大部分与岭南维新思想相关(大批研究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思想的著述可以说都是对岭南维新思想的研究)。但是,明确而集中地以岭南维新思想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尚未见到。

本著原为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计划编纂的《岭南文化通志》的一种,按学界同人商定的体例,在写法上尝试性地采取了学术志的形式。以此种形式撰述的“岭南维新思想”与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相比,其主要不同在于著述内容的系统全面性、史料的更为翔实性及表述上的某种特殊性。全书以维新领袖康有为、梁启超为中心,力图对岭南维新思想进行全方位的、比较详尽的述论,因此不但构筑了一个大致可以反映该思想全貌的著述体系,而且对此体系各部分、各层次亦尽量给予具体细致的归纳和分析。为了突出学术志的特色,本书在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辨析上下了较大的功夫,注

重以史料说话,对重要的史料甚少主观剪裁取舍,对相近的史料除重复甚多者外亦多加采录,对相异甚至相反的史料则加以比较辨析,尽可能以史料的全貌见思想的全貌,也希冀以此为他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这样在写作形式上,就不能不与学术论著的通常写法有显著的区别。虽然总的来说仍可称之为史论结合,实则议论极少,这并非刻意惜墨如金,而是为体例所限不得不然。

此外还应指出,尽管本书以史料的编排和陈述见长,而不像一般学术论著那样着重提出和充分论证研究者的新见解,但通观全书,不难看出作者的学术观点是十分明确的,而且在不少重要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关于康有为新的思想体系形成于《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撰写之前,关于岭南维新派的议院观,关于“大同三世”说的演变等)。当然,这些意见要充分表达出来,还有待于写成专门的论文。

如同其他社会思想一样,岭南维新思想有它兴起的原因、发展的轨迹和历史作用,在对此思想本身的内容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先对这些背景性的内容作一简要的分析。

一 兴起的原因

导致岭南维新思想兴起的具体因素很多,大致概括,有时势环境、思想文化和士人集结三大方面的原因。

(一)时势环境的影响

从宏观上看,中国近代维新思潮兴起的时势环境也就是岭南维新思想兴起的时势环境。这一时势环境最本质的内涵,是中国社会自鸦片战争以来所持续发生的深刻变动。两次鸦片战争彻底

结束了清朝政府对外深闭固拒的历史,同时形成了两千年所未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变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极大地冲击了清朝的统治,导致了汉族地方督抚势力的崛起和洋务运动的发生;持续 30 余年的洋务运动在相当广泛的领域里启动了中国近代化事业,但在任何领域都困难重重,未获成功,而与此同时,边疆危机、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接踵而至,不断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内外矛盾和加深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作为对这些变动的反映,中国曾先后出现了经世致用思潮、洋务思潮和早期改良思潮,而维新思潮则是直接被甲午战败后中国面临的救亡图存的严峻形势所召唤出来的。岭南与全国一道经历了这些变动,而且还应该说,这一地区由于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鸦片战争之前),持续的过程最长,发生的各种联系最多,中国近代社会所发生的变动在这里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就为维新思潮在岭南发源提供了重要的客观条件。

当然,具体考察,这些变动对岭南维新派人物的刺激,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以康有为为例,在由普通士人走向维新思想家的心路历程中,他最深切的、足以令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现实感受大致上有这样几种:

一是在亲身经历中随处可见的普通民众的苦难。康有为在 1889 年《与沈荊部子培书》中这样写道:“仆生于穷乡,坐睹族人、乡人困苦,年丰而无米麦,暖岁而无襦袴,心焉哀之。……十年讲求经世救民之学,而日日睹小民之难……所经之地,所阅之民,穷困颠愚,几若牛马,慨然遂有召师之责,以为四海困穷,不能复洁己拱手而谈性命矣。”^①过了两年,他又写信给沈子培说:“……曾誓

^① 《康有为全集》第 1 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80 页。

大愿不忍众生之痛,而特来此浊世,则不能避痛苦……回视民物颠连困苦,是皆与吾同生于天者也。吾岂忍焉,则日以救民物为职志,而又弃己之行乐。……因是一不忍之念,先不忍其所生之国,而思救之,遂遭奔播以至于今矣。”^① 这种对民众苦难的深切哀痛,康有为在后来的著述中还有更详尽的记载。

二是关乎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日益严重的外患内乱。表明康有为此类感受的文字极多,自从 1888 年开始代人草折和直接上书清帝以来,在 10 年时间里,他几乎是毫不间断地通过各种形式向朝廷或国人痛言中国已经和将要发生的巨大祸患,由于感受特别强烈,其言辞便也格外触目惊心。且看《上清帝第一书》中的一段:“窃见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翦,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教民会党遍江楚河陇间,将乱于内。臣到京师来,见兵弱财穷,节颓俗败,纪纲散乱,人情偷惰,上兴土木之工,下习宴游之乐,晏安欢娱,若贺太平。顷河决久不塞,兗豫之民,荡析愁苦,沿江淮间,地多苦旱,广东大水,京师大风,拔木百余,甚至地震山倾,皆未有之大灾也。……上下内外,咸知天时人事,危乱将至,而畏惮忌讳,箝口结舌,坐视莫敢发,臣所为忧愤迫切,瞻望宫阙而惓惓痛哭也。……国事蹙迫,在危急存亡之间,未有若今日之可忧也。”^② 第一书上于甲午战争前 6 年,时局还不算特别严峻,随着甲午战争、德国强占胶州湾、瓜分狂潮等相继发生,中国一步步被逼上绝境,康有为的痛

^① 《致沈子培书》,《康有为全集》第 1 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44~545 页。

^②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52~53 页。

楚便更加刻骨铭心,读上清帝第二书(即著名的“公车上书”)、第五书、第七书及《京师强学会序》、《保国会序》、《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等等,人们都不难体验到险峻的时势在康有为心中掀起了多大的波澜。

三是与中国的落后形成鲜明对照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先进性。对这一先进性的体认,有些来自直接的观察,“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①有些则来自对西方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的广泛了解,及中西之间的比较,“夫泰西诸国之相通,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曩代四夷之交侵,以强兵相陵而已,未有治法文学之事也。今泰西诸国,以治法相竞,以智学相上,此诚从古诸夷之所无也”,^②“泰西大国,岁入数十万万,练兵数百万,铁船数百艘,新艺新器岁出数千,新法新书岁出数万,农工商兵,士皆专学,妇女童孺,人尽知书。而吾岁入七千万,偿款乃二万万,则财弱;练兵铁舰无一,则兵弱;无新艺新器之出,则艺弱;兵不识字,士不知兵,商无学,农无术,则民智弱;人相偷安,士无侠气,则民心弱,以当东西十余造之强邻,其必不能禁其兼者,势也”。^③康有为在维新运动中始终坚持以西方为榜样和向导(具体采纳日本的变政模式),正是因为他对西方的先进性有着深切的感受。

康有为的上述种种感受在其他岭南维新派人物身上,由于年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10、11 页。

② 《上清帝第四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49 页。

③ 《上清帝第五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03 页。

龄、身世、个人经历、性格气质等的不同会有或大或小的差别,但质言之,他们都因受到时势环境的重大影响而产生维新思想,走上变法之路,则是一致的。

(二)思想文化条件

岭南维新思想作为一种反映和代表时代发展新方向、社会变革新要求的思想,首先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晚清的西学东渐,从鸦片战争前天主教传教士在澳门、广州等地的宗教宣传及自然科学知识介绍等开始,逐渐呈扩大之势。到维新运动发轫之际,西学的传播已通过种种方式和渠道形成相当的规模,对士人阶层发生广泛影响,成为维新思想产生的一项必不可少的条件。关于岭南维新派因受西学影响而思想发生根本变化的具体情形,本书将在第五章中作专门的论述。

其次,如前所述,在维新思潮兴起之前,中国已先后出现过经世致用思潮、洋务思潮和早期改良思潮,它们的出现既是中国近代思潮渐次更新演变的必经阶段,又是维新思潮得以兴起的必要准备。特别是早期改良思潮,在许多方面与维新思潮具有非常密切的前后相继的关系,而著名的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容闳、王韬、何启、胡礼垣、郑观应等,几乎都是岭南人氏(江苏人王韬的变法主张亦主要通过在香港主编《循环日报》而发表),他们都是岭南维新思想的先驱者,为岭南维新思想提供了足资继承和借鉴的宝贵思想文化资料。近代思想的这种依次(或交叉)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学术界已作过较深入的探讨,故不赘述。

再次,是传统文化及其岭南特色对岭南维新思想兴起所构成的思想文化条件,这点以往较少论及,需着重加以说明。

所谓维新思想,从其时代特征来说,是以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观念为主导、为核心的新思想,而从其历史脉络来看,其思想的

更新则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发生的。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的深厚功底,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旧到新的转变也就失去了必要的前提。岭南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们都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熏陶,在确立维新思想之前,都堪称能得传统文化之大略要旨精华的佼佼者。

康有其家族 13 世为士人,是个标准的诗礼之家。家族中当上大官的不多,但在文化事业和造诣上有成就者则可谓辈出。出身于这样的家庭,康有为所受的传统家教是非同寻常的。他的以文教为业的父辈都是对他耳提面命的良师,尤其是作为岭南醇儒的康有为祖父康赞修,对康有为的教诲更为经常。在祖父身边,年少的康有为“日闻其古贤哲之大义微言,日德古豪杰之壮节高行,浸之饫之,泳之游之”,^①“连州公日夜摩导以儒先高义、文学条理,始览《纲鉴》而知古今,次观《大清会典》、《东华录》而知掌故,遂读《明史》、《三国志》”。^②除家庭教育外,康有为从 6 岁起,还先后师从简凤仪、陈鹤桥、梁建修等多位先生,其中对康有为影响最大的是岭南近代名儒朱次琦。从朱先生那里,康有为学到“四行五学”,“四行者:敦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则经学、文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也”。他评价朱先生的学术特色是“壁立万仞,而其学平实敦大,皆出躬行之余,以末世俗污,特重气节,而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概括朱先生的治学之道是“动止有法,进退有度,强记博闻,每议一事,论一学,贯串今故,能举其词,发先圣大道之本,举修己爱人之意,扫

① 《连州遗集叙》,《康南海文集》,台湾宏业书局 1976 年版,第 259 页。
转引自马洪林著:《康有为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3 页。

② 《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4 页。

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感叹从学于朱先生“乃如旅人之得宿,盲人之睹明”。^①虽然康有为后来在思想和学术上超越了朱次琦,但从他在万木草堂讲学的内容和风格,在各类著述中显示的倾向和特色,以及他终生所信奉的理念、价值等等之中,不难看出朱先生在他身上所打下的传统文化的烙印。

·梁启超受传统文化的哺育与康有为有相似之处。他“四五岁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书、《诗经》,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②并先后受学于张乙星、周惺吾、吕拔湖、陈梅坪、石星巢等先生。15岁起在广州五大书院之一的学海堂学习,舍弃帖括之学而从事于训诂词章之学,成绩优异,“季课大考,四季皆第一。自有学海堂以来,自文廷式外,卓如一人而已”。^③18岁面见康有为,原来所学的训诂词章之学被康氏作为“无用旧学”而“更端驳诂,悉举而摧陷廓清之”。此后,梁启超“决然舍去旧学”(即旧的训诂词章之学),退出学海堂,转而师从康有为。梁启超从康有为那里受到了维新思想的启蒙,而传统文化的学习仍然是其从师康门的一项重要内容,“先生(指康有为——引者注)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先生又常为语佛学之精奥博大……日课则宋元明儒学案、二十四史、文献通考等”。^④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7页。

② 《三十自述》,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16页。

③ 林慧儒、陈侶笙:《任公大事记》,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

④ 《三十自述》,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6~17页。

康、梁之外,其他岭南维新派重要人物如黄遵宪、陈千秋、麦孟华、徐勤、欧榘甲等,莫不在传统文化的学习上下过苦功,造诣甚深。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岭南这一特定区域的长期发展演变中,还形成了一些鲜明的区域性特色,这些特色的影响与岭南维新思想的兴起是有内在联系的。岭南传统文化较突出的特色有三点:

一是对正统文化的异端性。古代在岭南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也是以儒学为代表的官方正统文化,但与其他区域不同的是,岭南文化的发展还受到地理因素、移民因素和罪官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通过经年的积淀,历代的流传,构成了岭南文化中的特殊成分。它们尽管并未改变岭南文化的基本性质,但却产生了一种“异端效应”。换言之,在岭南文化中,总是可以较多地听到一些与中原官方正统文化不甚和谐乃至很不和谐的声音。如明代中期岭南著名思想家陈献章敢于打破作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的垄断,提倡“自得之学”;康有为之师朱次琦在清咸、同年间宋学和汉学高踞庙堂的学术氛围下,力主经世致用以纠宋学之空疏、汉学之繁琐;与朱次琦同时的另一位重要思想家陈澧亦不受汉学宋学的束缚,强调治经学不但可以整理、贯串和发明,而且可以“辩难”、“排击”等,都是这种不和谐的突出表现。^①

二是对外来文化的吸纳性。岭南面对海洋,很早就成为中外贸易往来、中外文化交流的汇合之地。即使在清朝实行闭关政策后,广州也仍然是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并且是全国唯一的一个。

^① 参见丁宝兰主编:《岭南历代思想家评传》一书中的《陈献章评传》、《朱次琦评传》和《陈澧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